

專訪

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

鄭永年：兩岸關係發展順中國崛起是保障

「習馬會」塑平台 增「中華民族」共識

鄭永年簡歷

1962年生，浙江省余姚縣人。中國問題專家。1981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，主修國際政治。

1985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。同年進入碩士研究生班學習，主修政治理論。

1988年獲法學碩士學位，同年留校任教。

1988至1990年，先後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和講師。

1990年考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詹姆斯——麥迪遜獎學金，同年進入該校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。

1995年獲政治學博士。同年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——麥克阿瑟博士後研究基金，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。

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，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，主要著作有《未竟的變革》、《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》（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）、《中國改革三步走》等。

■鄭永年認為，兩岸關係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崛起的大背景，「習馬會」為兩岸搭建了一個附帶「九二共識」作為基礎的領導人對話平台。特派記者林舒婕攝



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11月7日在新加坡會面，踏出了自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政治互動往來的歷史性一步。中國問題專家、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兩岸關係發展離不開中國崛起的大背景，兩岸領導人在會面中重申並強化「九二共識」，並進一步達成了「中華民族的復興」這一共識，為「會面常態化」奠定了基礎，也設定了「門檻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林舒婕 新加坡報道

「兩岸的問題我說了很多，不過這個話題，依然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。」星期天的上午，鄭永年如約在國立大學Tower Block六樓的辦公室裡等待與記者的訪談。「這幾天真的很忙，剛去了一趟中國。」他一邊收拾桌上的材料一邊說道。不過7日這天，他還是靜下心來，看完了「習馬會」的相關資料。

「九二共識」為會面常態化前提

在鄭永年看來，習近平過去兩年多來對台灣問題、兩岸關係的公開講話，就已經表明，作為領導人，他希望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有所作為，找到突破點。不過這需要兩岸雙方具有共識基礎。「如果台灣方面，馬英九是陳水扁式的領導人，那麼就不會有這個會面。」鄭永年談到，「習馬會」開創了一種帶條件的可能性，會面平台已經搭建起來。但是能不能用，也就是「是否能夠常態化」則是有條件的。「以後的台灣領導人，無論是國民黨的也好，民進黨的也好，『九二共識』都是一個

基礎，沒有這個共識基礎，會面就不存在。」

他進一步談到，兩岸關係從江澤民時代，開啟了以「汪辜會談」為代表的民間交流；到了胡錦濤時代，開啟了以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的黨際交流，現在兩岸又開啟了領導人層面的交流，是飛越式的發展，會對未來的兩岸產生很大的影響。

「台灣意識」之上須有中華意識

在迄今為止的兩岸進程中，民進黨始終是「局外人」。「儘管目前很明顯的情況是，民進黨可能會再次『執政』，但是大陸不會與一個『台獨』政黨探討兩岸問題。」鄭永年認為，這些年來，台灣島內的「台灣意識」一直在強化。「和而不同是可以的，但是『台灣意識』並不簡單等於『台灣獨立』。」他舉例說，如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企圖通過政治方式塑造出一個新的「民族」，混淆認同問題，實際上是非常愚蠢（stupid）的。台灣有些政治人物，不聰明的地方就

在於，他們沒有看清楚，台灣意識是可以存在的，但是在此之上不能沒有「中華」或者是「中國」的意識。這也對兩岸和兩岸領導人提出挑戰。認同感是個體內在的心理因素，無法強加於任何人，只能來自於「軟」的方法。「台灣島內對於『九二共識』的認同，正是大陸多年來採取『軟方法』的結果。」鄭永年指出，從長遠來看，「中華認同」或者「中國認同」，也都會來自大陸對台的「軟」政策。

在領導人的層面，鄭永年較為擔憂台灣島內的走向。他認為，執政者不能要求一般民眾對所有問題都有所了解，在台灣，同樣無法要求每一個台灣人對大陸都有了解。執政者、精英們應當有意識地引導民意，而不是被選舉票化的民意「綁架」。「民意千千萬，其中真正有價值（value）、可以作為參考的有多少？作為執政者打算跟著哪一個民意走？執政者需要做的是作出決定並引導，而不是被民意幻化的選舉牽着走。」

「一帶一路」參與者需認清自身優勢

馬英九在會面中向習近平特別提出希望加入區域經濟整合，習近平回應說，歡迎台灣加入亞投行，以及「一帶一路」議題。

中國「富鄰」戰略助全球治理

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鄭永年，認為亞投行和「一帶一路」都是中國「走出去」的成功案例。他還將「十八大」以後的中國外交格局總結為「兩條腿一個圈」：第一條腿是和美國；第二條腿，是和新興發展中國家。「一帶一路」的核心就是周邊國家。中國

面臨周邊複雜的地緣環境，「一帶一路」作為中國的「富鄰」戰略，其核心是中國輸出資本和技術，幫助鄰國發展，實現共同富裕，其定位不僅是經濟項目，更應該是全球治理、區域治理的項目。中國正在嘗試的這種新模式能夠「給中國一個機會」，世界也可能會因此「不一樣」。

中國為什麼要主導「一帶一路」？鄭永年在早前的演講中就提到，正在全面推行的「一帶一路」戰略與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密不可分。「一是中國有過剩的資本，二是中國有過剩的產能，三是中國有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優勢，而且中國可以利用技術優勢，在建設過程中傳

遞綠色理念。『一帶一路』加『綠色』等於世界共同繁榮。」鄭永年表示，「走出去」是中國現在「必須要做」的事。「中國上世紀80年代是將資本『請進來』，90年代開始與國際接軌，現在資本過剩了，自然要『走出去』。」

「『一帶一路』是一個開放平台，台灣可以參與，香港也可以參與。」鄭永年說道，重點在於參與者需要認清自己的優勢，以新加坡為例，在與中國的交往中，有人民幣結算等優勢。台灣和香港，如果想要很好地參與進包括「一帶一路」在內的一系列大陸主導的戰略體系中，也應該先認清自己的優勢所在。

台行對抗路線 將無國際空間

習近平在與馬英九的會面中談到，「我們應該以行動向世人表明，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、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。」鄭永年在受訪時特別提到習近平的這段發言，他指出，這不等於兩岸事務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狀態下來協商解決，「這也是不可能的」。

鄭永年談到，台灣島內的政治現實是，政治力量有很多是親美的，不能把這個現實理想化。中國要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中立化，沒有什麼可能性。長期來說，需要將台灣問題置於國際關係之中。

過去三十多年，大陸經歷了五任總書記，人均GDP從二、三百美元提升到了7,800美元，成為世界第二

大經濟體；而同樣經歷了五任總統的美國，在經歷了海灣戰爭後，除了軍事，其他方面的發展全面放緩，並由相對衰落的方面產生了缺乏自信的「中國威脅論」。對此，鄭永年指出，中國從未說要將美國趕出亞洲，只是希望美國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，包括台灣問題。

通過合作拓國際空間

於台灣而言，基於美國《與台灣關係法》的「庇護」，與美國的聯繫是客觀存在的。與此同時，國際空間的拓展也是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政綱重點。鄭永年分析說，對於台灣來說，拓展國際空間有兩種方式，一是與大陸合作的方式，一是對抗的方式。

「在陳水扁執政時期，他採取了一個對抗的方式，按照現實的情況，走對抗路線，台灣最後肯定『一個邦交國』沒有，台灣的國際空間，是馬英九執政時大，還是陳水扁執政時大，大家看得很清楚。」他提出，主權不能分享，但是主權可以共享，唯必須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式。關於這一點，7日的習馬會上雙方也有觸及，根據馬英九在記者會上的轉述，習近平回應表示，大陸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想法和感受，重視並推動解決了許多與之相關的問題。只要不造成「兩個中國」、「一中一台」，雙方可以通過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。

特稿

曾經有法國媒體轉述一位熟悉北京政情的媒體人說法，稱習近平多次閱讀和會見的政治作家，是任教於新加坡的華裔學者鄭永年，這一細節沒有得到他本人的直接證實，不過，在公開渠道中，鄭永年至少先後兩次對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政治發表看法。

去年10月，鄭永年在新加坡發表演講，預判中國未來發展路徑，提出了習近平時代的概念，談了對目前的反腐、政治改革、習近平的個人魅力等話題。

2015年3月鄭永年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創辦的微信公號「俠客島」的採訪，標題更為直接：「中國現在需要強勢的習近平」。

根據鄭永年的說法，「中國進入後鄧小平時代，習近平承接毛、鄧，規劃未來三十年」，此外，習近平結束分權狀態，走向集權。

抓住反腐機遇一反到底

鄭永年認為，集權跟反腐敗有關係，這次反腐敗主要是反寡頭。「中國當下的反腐敗可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機遇。如果習近平不反腐，再過十年你就反不動了，那時候既得利益集團會變得很強大，如果最後從經濟寡頭轉成了政治寡頭，就會像以前的俄羅斯，或者今天的烏克蘭那樣。一定要抓住現在的機遇，一反到底。」

鄭永年稱，對於中國經濟從數量經濟轉變為質量經濟的前景，他一直是持樂觀態度的。「中國的轉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型，遇到任何問題，都是很正常的，我們關注的是中國如何對待這些問題。大轉型需要有擔當的領導者。」

大轉型需強勢領導者



■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在的Tower Block。特派記者林舒婕攝